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198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魏立佳¹, 李媛²

(1. 厦门大学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国务院2010年“9号文”的公布表明我国已经开始逐步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 围绕这一文件政府、学界和外企都有各自不同的意见。本文以1988~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 构建FDI率和经济增长率的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 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 从整体上看,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对外资有显著的吸引作用, 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第二, 1997年前后, 中国经济增长率与FDI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第三, 从区域上看, 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经济增长率与FDI率的动态关系较紧密, 二者在西部省份的关系不显著。最后, FDI率目前在中国将长期稳定, 2010年国务院9号文的出台不会给中国的FDI趋势造成显著的影响, 也不会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率。

关键词: 经济增长率; 外商直接投资; 超国民待遇; 面板向量自回归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00(2011)02-0052-10

一、引言

2010年4月13日, 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9号文), 该意见的公布表明我国已经开始逐步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 以该文为基础将进一步出台相关法规和文件, 从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力求让企业在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下竞争, 这是对吸引外资政策的进一步改善。这份标志性的文件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时代结束了^①。

在金融危机硝烟未散的时候出台这样一份政策是否恰当, 政府、学者们、外企乃至外国政府、媒体各执一词。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采用比较先进的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 讨论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 以及“超国民待遇”政策退出对未来FDI和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全球FDI的大量流入, 成为世界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截至2010年3月份, 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企业近69万家, 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 中国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近40%的情况下, 2009年中国吸收外

收稿日期: 2010-11-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2010年度首届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项目; 厦门大学第七期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魏立佳(1982-), 男,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李媛(1987-), 女,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① 引自新华社主办《瞭望新闻周刊》4月25日文章“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谢幕”。

资仍保持在 900 亿美元的高位, 仅下降 2.6%, 居全球第二。

这样巨量的外资引进是以其长期以来在中国获得的“超国民待遇”为基础的。首先, 中国政府对外企的税收一直采取优惠的政策。据统计, 国企的税收平均是收入的 30%, 民企是 20% 左右, 而外企平均下来只有 12% 左右, 如果在同一个行业经营, 这显然对于国企和民企是不公平的。其次, 地方政府用超低的地价引进外资, 许多地方政府甚至用零地价或者象征性的地价来吸引外资。据平新乔教授的一项调查, 在一些东部省份, 外资企业只需要当地地价的 1/5 ~ 1/3 就能够拿到土地^①。第三, 外资企业的排污行为被地方政府容忍。根据非政府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名单, 2006 年有 33 家在华知名跨国公司环保违规。名单上的企业是从各地方环保局网站搜集的, 这些公司包括 5 家“世界 500 强”的在华企业, 但他们的运作并没有受到其环保违规的影响。

不可否认, 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的发展极度缺乏资本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引进的外资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燃眉之急, 为使中国从一个百废待兴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大国做出了贡献。但时至今日, 中国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工业体系较为完备, 国内资本比较充裕, 国际化程度稳步提高。此时, 是否继续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是一个学界和政府部门争论已久的话题。

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 FDI 究竟从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人们普遍发现, FDI 与经济增长是有某种联系的, FDI 相对较多的地区, 经济增长较快。但是, FDI 和经济增长率的内在联系并不明确, 究竟是 FDI 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增长, 还是该地区经济高增长率吸引了外资前来“淘金”。^②

近十多年以来, 国外有许多文献对 FDI 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德梅洛 (De Mello, 1997) 认为, FDI 能通过两种形式影响经济增长。首先, 通过资本的溢出效应促进产业中的技术革新。其次, 能够通过工人技术培训, 先进组织和管理方法的运用, 达成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溢出^[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 2002 年对 14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 发现其中 11 个国家 FDI 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这两份研究一致认为, FDI 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是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 只有当一国的技术和教育水平较高, 才能够承接 FDI 的知识和经验外溢, 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2]。布莱斯顿等 (Blomstrom 等, 1994) 发现只有当一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程度时, FDI 才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3]。巴拉舒伯拉曼雅姆等 (Balasubramanyam 等, 1996) 认为, 贸易的开放程度是 FDI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决定因素^[4]。詹科夫和霍克曼 (Djankov 和 Hoekman, 1999) 指出在东欧和中欧的国家中, 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负向的^[5]。仁伯斯坦等 (Borensztein 等, 1998) 认为, 只有当教育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FDI 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6]。阿法罗等 (Alfaro 等, 2004) 认为, 开放的金融市场才是二者关系的重要前提条件^[7]。卡科维奇和列文 (Carkovic 和 Levine, 2002) 的研究表明, 在控制最初收入和国别因素之后,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8]。乔杜里和马诺塔斯 (Chowdhury 和 Mavrotas, 2006) 发现有些国家的 FDI 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有些国家则不是^[9]。我们可以看出, 国外的研究并没有对 FDI 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结论, 但这些研究都比较认同二者的动态关系受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教育、市场化程度和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 郭熙保和罗知 (2009) 运用 1999 ~ 2006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 FDI 对 GDP 增长率的单向关系。该文发现, 外资在 FDI 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且 FDI 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10]。唐素梅等 (Tang 等, 2008) 使用了 VAR 模型分析了 1988 ~ 2003 年的全国

① 2007 年第四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之上“平新乔、贾康、刘守英: 财政和税收政策回顾与展望”。

② 四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被称为“金砖四国”。这个简称来自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国名开头字母 BRICs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的谐音 (意指“砖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 2006 ~ 2008 年, 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10.7%。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2008 年的调查报告,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分居全球最具吸引力投资国的前三名。

FDI 和 GDP 的时序数据,发现 FDI 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11]。罗长远 (2007) 发现, FDI 对国内资本存在挤入作用,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促进了市场化进程^[12]。郭庆旺和贾俊雪 (2005) 在四种全要素生产率估算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由此可以认为, FDI 对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3]。单约旦 (Shan, 2002) 采用 VAR 模型分析了 1986 ~ 1998 年中国的季度数据,结果显示产出和 FDI 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14]。陈浪南和陈景煌 (2002) 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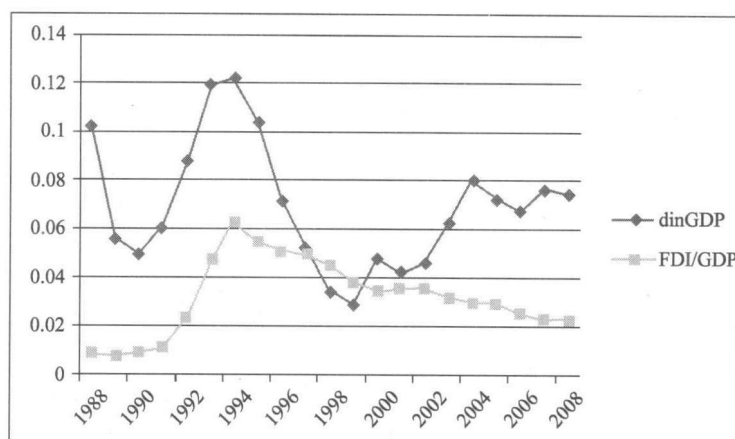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 GDP 增长率和 FDI 占 GDP 比重 (1988 ~ 2008 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8 ~ 2008 年。

从图 1 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8 ~ 1997 年,我国的 GDP 增长率和 FDI 占 GDP 的比重基本保持相同的变动趋势。第二阶段是 1997 年以后,两者开始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动趋势。从图 1 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定性的结论,即经济增长与 FDI 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是简单的、固定的线性关系,这种相关性有可能在 1997 年前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本文采用了拉夫和斯基诺 (Love 和 Zicchino, 2006) 的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 (PVAR) 模型^[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时序子面板和区域子面板数据的参数估计,以及脉冲响应图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来检验 GDP 增长率和 FDI 率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实证分析

本文的 GDP 数据取自 1988 ~ 2008 年间的中国统计年鉴,采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数据处理时,首先剔除数据不完整的两个省,包括西藏和青海。其次,由于重庆和四川的数据自 1997 年起才开始分开核算,这种区域划分的变动直接影响了 1997 年以前数据的有效性。因此,为保持研究对象的稳定性,在处理中拟将这两个省市的数据资料也剔除掉,最终取得 27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统计资料。FDI 数据来源于 CEIC 中国经济数据库,汇总了 1988 ~ 2008 年中国各地区实际使用的外商投资数额。

(一)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建立 PVAR 模型的前提条件是,模型中的相关变量必须是平稳的。因此,在进行模型参数估计前,需首先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来分别检验数据 0 阶滞后到 4 阶滞后时间序列的单位根,结果发现 2 阶滞后数据的平稳性较好。

表1 面板数据单位根 (Levin - Lin - Chu) 检验

二阶滞后	
差分对数国内生产总值 (dlnGDP)	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FDI/GDP)
-11.071	-11.147
[0.0054]	[0.0002]

注: H0: 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 H1: 面板数据是平稳的。方括号内为 p 值。

为适合本文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单位根 (Levin - Lin - Chu) 检验, 得出拒绝原假设的结论, 说明差分对数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省际面板数据都是二阶滞后平稳的。

(二) 全样本分析

分别以差分对数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模型的自变量对全样本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 可以得到如下两个回归结果。表格中, 第一行为参数的估计值, 第二行的括号内为 t 统计量的数值。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

表2 全样本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参数估计

面板 A	dlnGDP	FDI/GDP
Lag (1) dlnGDP	0.85 ***	0.07 ***
	(19.88)	(6.24)
Lag (1) FDI/GDP	0.31	0.94 ***
	(1.56)	(10.10)
Lag (2) dlnGDP	-0.03 ***	-0.03 **
	(-6.89)	(-2.59)
Lag (2) FDI/GDP	-0.07 ***	-0.17 **
	(-3.78)	(-2.12)

注: *** 显著水平为 0.01, ** 显著水平为 0.05, * 显著水平为 0.1。

图2 是二阶滞后差分对数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二阶滞后脉冲响应图。在图2a至图2d中, 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 以年为单位; 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图中的实线为响应函数的估计值, 虚线为响应函数值 [5%, 95%] 的置信区间。

从图2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经济增长率和 FDI 之间互相影响的不同模式。从本质上来说, FDI 是一种逐利资本, 其在中国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吸引。外资在进入中国后, 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 搭上了中国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 摄取了巨额利润。也正是因为高 GDP 增长率对 FDI 的这种吸引关系, 几个经济增长快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被称为“金砖四国”。

本文在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中, 并未发现 FDI 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长期促进作用。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释: 首先, 中国的经济是投资拉动型经济, 但投资的主体是政府、银行信贷和私人投资, FDI 只在投资中占很小的比例, 并不是投资的主力。其次, 各级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本意是以空间换时间, 希望能够引进外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当地经济。但从 30 多年引进外资的经验来看, 许多外资只是把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搬到了中国, 对核心技术却始终控制严密, 研发部门绝大多数留在了本土。而且, 外资企业的管理高层多为外籍人士, 中国本土的管理人才依旧十分匮乏。从这个层面来说, 引进外资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实现, FDI 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速度产生长期的正面影响。最后, 从历史数据来看, 有相当部分的外资是“热钱”, 它们随着中国经济的过热泡沫而来。“热钱”的出现通常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在 1~2 年之后会出现减缓, 这就是本文图 2b 所表达的含义。

表1 是面板数据单位根 (Levin - Lin - Chu) 检验数据二阶滞后时的结果。与前面几种检验有所不同, 首先, 面板数据单位根 (Levin - Lin - Chu) 检验考察的是整个面板数据的平稳性, 而不针对某一省份的时间序列。其次, 该检验比较适合个体个数大于时间序列长度的面板数据。有些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譬如多变量单位根 (MADF) 检验) 只适用于时间序列长度很大的情况。由于本文中使用的数据时间长度为 21、省份个数为 27, 所以面板数据单位根 (Levin - Lin - Chu) 检验更

对回归系数的结果进行解读发现, 当 GDP 增长率作为因变量时, 一阶滞后 GDP 增长率是显著的且回归系数高达 0.85, 而一阶滞后 FDI/GDP 是不显著的; 两个二阶滞后的自变量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且为负。这反映了 FDI 对 GDP 增长率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相应的, 当 FDI 作为自变量时, 其显著受到了自身和 GDP 增长率一阶滞后的正影响; 两个二阶滞后的自变量的影响同样都是显著的且为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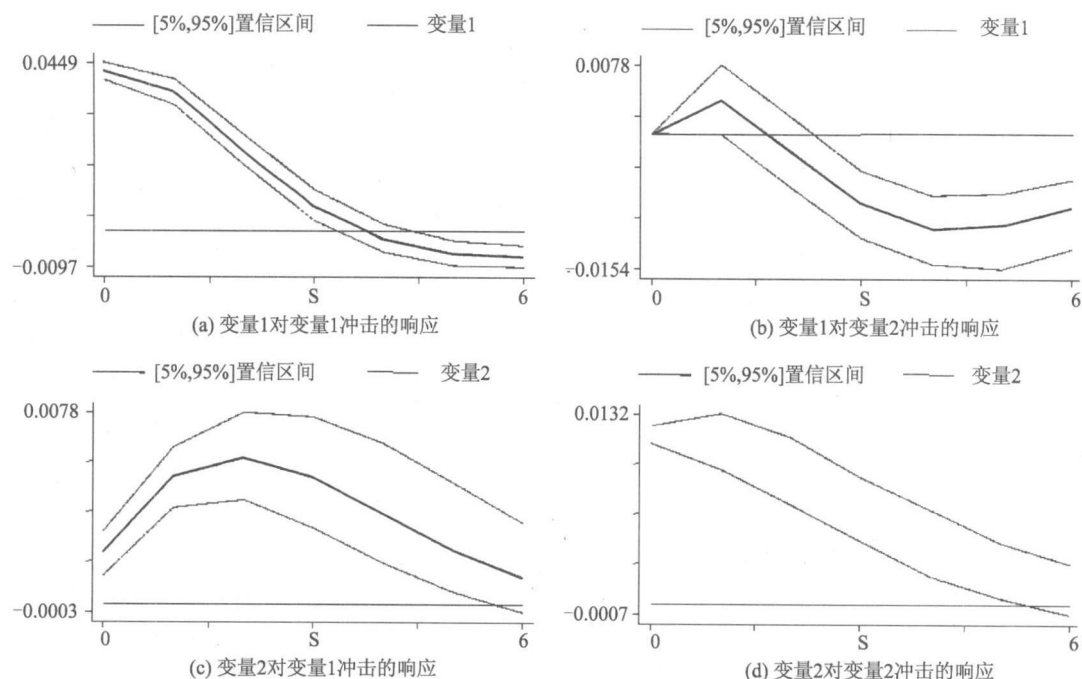


图2 dlnGDP 和 FDI/GDP 二阶滞后脉冲响应图 (全样本)

注: 置信区间为 [5%, 95%] 数据来源于 500 次蒙特卡洛模拟。变量 1 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dlnGDP); 变量 2 为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FDI/GDP)。

(三) 经济结构性转变分析

从图 1 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 GDP 增长率和 FDI 率的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88 ~ 1997 年是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 GDP 增长率和 FDI 率之间的关系比较明显, 二者表现出一种同步变化的趋势。1997 年之后是第二阶段, GDP 增长率和 FDI 率的关系较为复杂, GDP 增长率稳步提高, FDI 占 GDP 的比重却逐年下降。

因此, FDI 与经济增长率的动态关系也有可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本文将全部省际面板数据分为 1988 ~ 1997 年和 1998 ~ 2008 年两个部分, 分别构建 PVAR 模型, 并绘制脉冲响应图。从表 3 可以看出,

表 3 1997 年前后的 PVAR 模型参数估计

	面板 B: 1988 ~ 1997 年		面板 C: 1998 ~ 2008 年	
	dlnGDP	FDI/GDP	dlnGDP	FDI/GDP
Lag (1) dlnGDP	0.87 ***	0.07 ***	0.53 ***	0.03 *
	(-13.88)	(-3.75)	(-8.18)	(-1.79)
Lag (1) FDI/GDP	0.55	0.92 ***	0.35	0.51 **
	(-1.61)	(-6.48)	(-0.94)	(-2.23)
Lag (2) lnGDP	-0.35 ***	-0.05 ***	0.13 *	0.00
	(-7.97)	(-2.86)	(-1.94)	(-0.25)
Lag (2) h_ FDI/GDP	-0.69 **	-0.16	0.03	0.08
	(-2.43)	(-1.48)	(-0.17)	(-0.85)

注: *** 显著水平为 0.01, ** 显著水平为 0.05, * 显著水平为 0.1。

1997 年之前经济增长率和 FDI 二者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很显著。1997 年之后，经济增长率和 FDI 二者仅仅对自身的短期滞后阶是显著的，而它们之间的短期相互关系和长期关系均不显著。

从图 3 和图 4 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1997 年前后的国企改革使 GDP 增长率与 FDI 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转变。从 GDP 增长率的自身惯性来看，1997 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波动要远小于 1997 年以前。1997 年以后，GDP 增长率自身冲击的响应更为平滑，且不会收敛到负影响。与此类似，1997 年以后 FDI 对 GDP 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较小，但这种影响更为长期和平滑，且并未收敛到负。这显示 1997 年的国企改革以后，我国的经济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经济波动更加平滑，自主创新和发展的能力稳步提高。而且，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日趋理性，外商投资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有些实力较强的外资企业也在中国设立了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同时，中国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的稳步提高，也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例如高速铁路技术等），从而使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能够起到更长期和良性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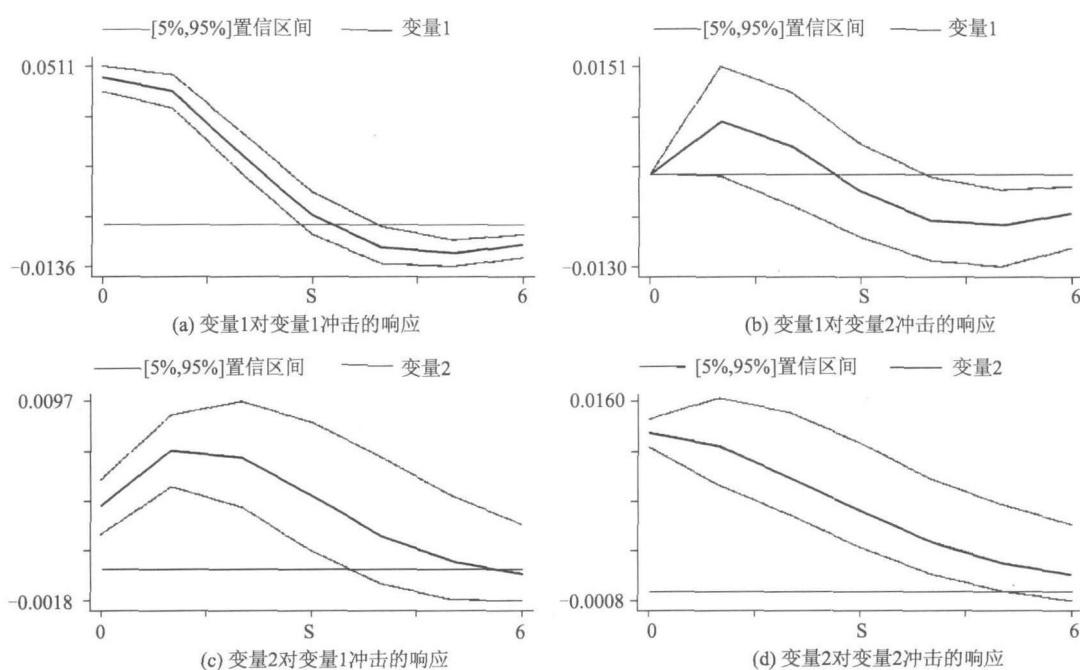


图 3 $\ln\text{GDP}$ 和 FDI/GDP 二阶滞后 VAR 脉冲响应图（1988 ~ 1997 年）

注：置信区间为 [5%，95%] 数据来源于 500 次蒙特卡洛模拟。变量 1 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ln\text{GDP}$ ）；变量 2 为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FDI/GDP ）。

经济增长率对 FDI 的影响在两个时间段之间也有区别。1997 年以后的 GDP 快速增长对 FDI 的正向影响要小于 1997 年之前，但其正向影响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且呈现出明显的“平峰厚尾”。同时 FDI 率自身的惯性也显得更为平滑。这表明外商的投资也日渐理性，不是简单的追逐优惠政策和高增长率，也不太受到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而是把其在中国的发展当成公司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逐渐完善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对未来的发展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FDI 和经济增长率的动态模型在 1997 年前后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国于 1997 年前后启动了全面的国企改革。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合称三资企业）。国有企业由于体制僵化，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下的竞争环境，导致年年亏损。1997 年，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已达 39.11%，全年实现净利润仅 856.5 亿元；而 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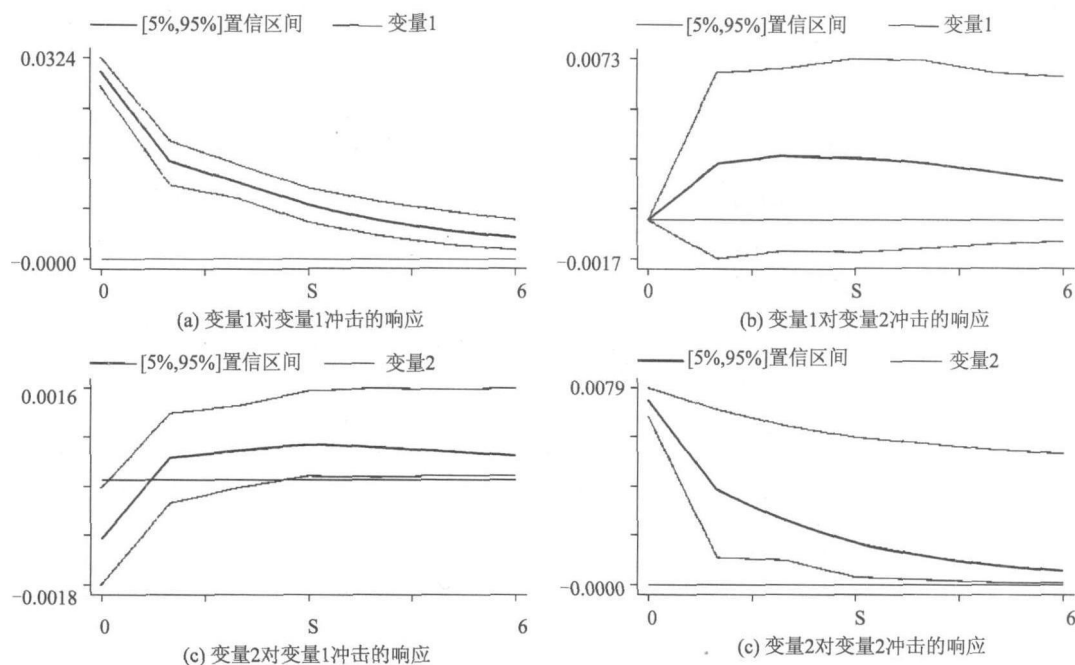


图4 $\ln GDP$ 和 FDI/GDP 二阶滞后 VAR 脉冲响应图 (1988 ~ 2008 年)

注：置信区间为 [5%, 95%] 数据来源于 500 次蒙特卡洛模拟。变量 1 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ln GDP$)；变量 2 为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FDI/GDP)。

国有企业实现净利润仅仅只有 213.7 亿元。在经过国企改革的阵痛期后，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主力军。2008 年，国企总利润已经高达 13307 亿元。正因为国企的重新崛起，FDI 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开始慢慢的降低。其次，1997 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外资热钱纷纷从东亚和东南亚诸国逃离。但我国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并不大，经济仍然维持高速增长，人民币在金融危机中也依然保持坚挺，这使外资对中国政府的信誉和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在此之后外商在中国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稳定的长期行为。

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式。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国企改革完成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了更加自主和良性的发展轨道，外资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旧对外资保持着一定的吸引力，但吸引力已有所减弱，巴西、印度、俄罗斯和越南等国家也相继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国家。2008 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2008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减少 14%，2009 年更锐减 40%。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2009 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仅减少了 2.6%。这说明外资在国内的投资更趋向长期和理性，较少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

所以，在全球经济普遍开始复苏的 2010 年，国务院 9 号文的出台不会明显的影响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更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速度。9 号文旨在为国内创造更为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逐步淘汰部分靠特殊优惠政策生存的外资，支持和鼓励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节能环保的外商投资，限制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产业的外商投资。这不但不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反而会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转型动力和发展机遇。

(四) 区域差异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的产生，是依据各自的地理位置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演变而形成的。由于自然条件与资源的不同，三大经济区有着各自的发展特点。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

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共 12 个省、直辖市。东部地区背负大陆，面临海洋，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且开发历史悠久、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技术力量较强。东部地区的工业基础雄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龙头作用。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共 9 个省、自治区。中部地区位于内陆，地理上承东启西，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其能源和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且重工业基础较好。西部地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共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部地区因自然条件限制，开发历史较短，经济发展和技术管理水平与中、东部差距较大，但国土面积大，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表 4 分区域模型的参数估计

	面板 D: 东部		面板 E: 中部		面板 F: 西部	
	dlnGDP	FDI/GDP	dlnGDP	FDI/GDP	dlnGDP	FDI/GDP
Lag (1) dlnGDP	0.90 ***	0.13 ***	0.90 ***	0.03 ***	0.68 ***	0.02 **
	(-15.56)	(-5.60)	(-11.63)	(-4.03)	(-7.24)	(-2.07)
Lag (1) FDI/GDP	0.38 *	0.89 ***	-0.08	0.88 ***	-0.09	0.61 **
	(-1.77)	(-8.77)	(-0.09)	(-9.10)	(-0.10)	(-2.49)
Lag (2) dlnGDP	-0.34 ***	-0.05 **	-0.25 ***	-0.02 ***	-0.04	-0.01
	(-6.82)	(-2.21)	(-3.94)	(-2.79)	(-0.44)	(-1.01)
Lag (2) FDI/GDP	-0.71 ***	-0.12	-1.37 **	-0.12	0.11	-0.16
	(-3.53)	(-1.36)	(-2.01)	(-1.25)	(-0.11)	(-0.96)

注:*** 显著水平为 0.01,** 显著水平为 0.05,* 显著水平为 0.1。

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产生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的经济结构，也导致了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和 FDI 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同模式。本文将省际面板数据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分成三个部分，分别使用面板 PVAR 模型进行了分析。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表 4）显示，东部和中部经济增长率与 FDI 率之间的关系较为类似，经济增长率和 FDI 率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稍有不同的是，东部省份的 FDI 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于中部省份，且对于相同的一阶滞后经济增长率，东部省份经济增长率对 FDI 的正向促进作用是中部省份的四倍多。

东部省份与中部省份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东部沿海地区拥有中国首批开放的全部 5 个经济特区和绝大多数开放城市，这些城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急先锋和主力军。在政策未开放之前，外资受其限制只能投向这些地区。其次，与中部的重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前就比较完善不同，沿海的工业体系许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许多城市的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的依存度很高，如苏州、深圳等。最后，由于东部沿海省份的先发优势和政策优势，东部沿海省份的地方政府更加灵活和高效，与国际接轨的程度更高，这也成为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东部及中部省份相比，西部省份的 GDP 增长率几乎不受 FDI 的影响。由于西部的自然环境相对特殊，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以农牧业，农、畜产品加工业，资源采掘加工业等为主。中国的农牧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不太适合 FDI 的进入。而毛纺业和棉纺业则限制外资进入。同时，中国还限制了外资进入多种资源的采掘加工业。因此，西部的经济更多是自成一体，主要依靠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投

人,对外资的依存度很低。

国务院9号文的公布说明政府将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为外商投资在中西部地区提供政策支持和优惠条件,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中部省份更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承接东部省份外资转移的优势。西部地区如重庆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优势。一方面,从模型参数估计和脉冲响应图来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独立,没有和外资互补的产业结构;而中部人口稠密,经济基础较好,交通便利,比较适合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许多地方高原缺水,并不具备引进外资的外在条件。

三、结论

本文运用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使用198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率和FDI之间的动态关系作了多方位的研究,包括全样本分析、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分析和区域差异分析。通过PVAR模型的参数估计、脉冲响应图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到了以下一些基本结论:第一,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对外资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外资对经济增长有短期正向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第二,1997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与FDI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变得不显著了。1997年以前,FDI对经济增长率的累积作用为负;1997年以后,该累积作用为正。第三,从区域上看,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经济增长率和FDI的动态关系相近,而二者在西部省份的动态关系不显著。最后,脉冲响应图和方差分解图说明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将长期稳定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目前正是FDI“超国民待遇”政策退出的最佳时机。首先,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不显著了,该政策的退出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其次,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该政策的退出不会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较大的冲击。最后,在全球经济回暖的时候退出该政策,有利于把此政策的国际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迄今执行已逾30年,从最初的封闭惧怕,到随后的无条件引进,再到今天的“超国民待遇”落幕,外资在中国的成长史是中国经济发展史的重要一章。在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中国走向新一轮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很有必要对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引进外资政策以及中西部承接外资产业转移模式进行反思。从2010年的国务院9号文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已经有了明确的想法和措施,但9号文的具体实施还有待许多配套规定的制定,以及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积极落实,这些政策也应该依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客观条件合理安排。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以2010年作为一个新的结构性转变点,分析该点前后FDI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动态关系的转变,东部、中部和西部因为政策调整而产生的新的发展机遇,以及更加合理有效的地方政府配套政策安排。

参考文献:

- [1] De Mello L 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rowth: A Selective Surve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7, 34(1):1-34.
- [2] OEC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Development: Maximizing Benefits, Minimizing Costs[R]. OECD Policy Brief (Paris: OECD), 2002.
- [3] Blomstrom M, R E Lipsey, M Zejan. What Explains Developing Country Growth[Z]. NBER Working Paper No. 4132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4.
- [4] Balasubramanyam V N, M Salisu, D Sapsfo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EP and IS Countries[J]. Economic Journal, 1996, 106(434):92-105.
- [5] Djankov S, Hoekman B.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zech Enterprises[R].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9:14-49.
- [6] Borensztein E, J De Gregorio, J W Lee.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

ics, 1998, 45(1): 115 – 135.

- [7] Carkovic M, R Levine.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EB/OL]. <http://www//ssrn.com/abstract=314924>.
- [8] Chowdhury A, G Mavrotas. FDI and Growth: What Causes what? [Z]. The World Economy, 2006.
- [9] 郭熙保, 罗知. 外资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09, (5): 52 – 65.
- [10] Tang S, Selvanathan E A, Selvanathan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Z]. Research Paper, 2008.
- [11] 罗长远. FDI 与国内资本: 挤出还是挤入[J]. 经济学, 2007, 6(2): 381 – 393.
- [12] 郭庆旺, 贾俊雪.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1979—2004[J]. 经济研究, 2005, (6): 51 – 60.
- [13] Shan H. A VAR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s of FDI in China[J]. Applied Economics, 2002, (34): 885 – 893.
- [14] 陈浪南, 陈景煌.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02, (6): 20 – 26.
- [15] Love L, L Zicchino.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Invest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Panel VAR[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6, (46): 190 – 210.

A Study of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FDI and Provin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988 ~ 2008 Provincial Data

WEI Li – jia¹, LI Yuan²

- (1. 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 2. Economics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announcement of State Council Document No. 9 indicates that China has begun to gradually adjust the policy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Government officials, scholars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have different views to this docu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VAR model to analyze the Chinese provincial data 1988 – 2008. From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is paper has four conclusions. First, viewed as a whole,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rates of China significantly attracted the FDI, but the positive impacts from FDI on our economic growth were not significant. Second,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FDI had structural changes in 1997. Third, the relationships in China's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in western region. Last but not less important, the FDI ratio is stable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the announcement of State Council Document No. 9 will not have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FDI and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rate.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rate; FDI; excess national treatments; panel VAR

(责任编辑: 罗 曼)